

主编 / 袁晓文
副主编 / 罗凉昭 耿静

西南民族与南方丝绸之路

XINANMINZU YU NANFANG SICHOUSHILU

民族出版社

中国民族研究团体联合会、四川省民族研究所资助出版

西南民族与南方丝绸之路

XINANMINZU YU NANFANG SICHOUSHILU

主编 / 袁晓文
副主编 / 罗凉昭 耿静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南民族与南方丝绸之路/袁晓文主编.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16. 11

ISBN 978 - 7 - 105 - 14732 - 8

I. ①西… II. ①袁… III. ①少数民族—西南地区—文集 IV. ①K280. 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96098 号

策划编辑: 虞农

责任编辑: 欧泽

封面设计: 金晔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 编: 100013

网 址: <http://www.mzpub.com>

印 刷: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数: 315 千字

印 张: 11.75

定 价: 35.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14732 - 8/K · 2574(汉 1450)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文编辑一室电话: 010 - 64271909

发行部电话: 010 - 64224782

目 录

南方丝绸之路研究

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研究	何耀华 (3)
南方丝绸之路：中印交通与文化走廊.....	段渝 (14)
论开发建设唐蕃古道沿线对实现“一带一路” 大战略的意义	车明怀 (34)
贵州民族地区融入“一带一路”试探	陈国安 (51)
茶马古道旅游开发及开发中的民族 问题研究	袁晓文 陈东 (59)
“一带一路”视阈下南北丝路旅游走廊建设构想	赵明龙 (71)
我国海路与陆路的海外移民 ——以福建和云南的海外移民为例	曾少聪 (87)
韦皋联合南诏的行动与唐代南方丝绸之路的重开 ...	赵心愚 (104)
高原丝路：吐蕃“重汉缯”之俗 与丝绸使用	石硕 罗宏 (119)
从史籍及《格萨尔》看丝绸之路与西藏的关系	保罗 (146)
滇茶销藏之海上通道的兴起及背景	刘志扬 (162)
试论“岷江道”的历史及其功能	陈东 (174)

西南少数民族研究

- 土家族地区古镇建筑选址、功能及其
工艺特征 黄柏权 聂亚林 (193)
- 略论凉山尔苏藏族与彝族民俗
文化的交融 陆 刚 李平凡 (201)
- 论明清时期云南绅士阶层的地方文化
建设和事务管理 李良品 廖佳玲 (216)
- 雾社事件与台湾少数民族族群关系 周慧慧 董建辉 (233)
- 清代大小金川土司的人口数量问题 曾现江 (255)
- 近代藏彝走廊回、藏民族关系述略 马尚林 马 良 (268)
- 长江经济带与西南民族地区的绿色发展机遇 李 锦 (278)
- 门巴族、珞巴族扶持效果评估 朱玉福 (290)
- 灾后羌族移民的精神文化调适 耿 静 刘俊波 (302)
- 岷江上游羌族社会中的羊神、女神与
萨朗歌舞 陈安强 (315)
- 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移民社区研究
——以成都“藏族文化街”为例 王海燕 (328)
- 凉山彝族习惯法的法制化路径探析
——以民族区域自治法变通补充规定
研究为核心 苏红丽 (339)
- 彝族“鬼源”神话中的禁忌
——对《孜孜妮楂》的文学人类学
分析 张海彬 何文海 (351)
- 凉山义诺彝族季节性仪式及其信仰文化探究 张可佳 (359)

南方丝绸之路研究

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研究

何耀华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浪潮，正把我国西南推向中国向南亚、东南亚、西亚、东非开放的前沿。这个地区有 50 多个国家，近 30 亿人口，不仅具有与我国合作发展的巨大潜力，而且也是我国通往欧洲的亚欧第三大陆桥的载体。南方陆上丝绸之路是中国丝绸之路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开通的时间最早，历史最悠久。沿线地区自然资源富集，历史文化积淀丰厚。在我国实施对外开放西进战略，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今天，研究南方丝绸之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南方陆上丝绸之路开通的时间

南方丝绸之路，历史上有蜀身毒道、蜀天竺道、蜀印度道之称。“身毒”一名始见于《史记·大宛列传》，因西汉元狩元年（前 122）张骞出使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归来，向汉武帝说大夏人称印度为身毒，而被司马迁记入《史记》；东汉至隋时期，根据《后汉书·西域传》“天竺国，一名身毒，在月氏之东南数千里，俗与月氏同”的记载，“身毒”被改称为“天竺”；唐以后又根据

作者简介：何耀华，云南社会科学院原院长，云南省文史馆员、研究员。

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二“天竺之称，异议纠纷，旧云‘身毒’，或曰贤豆，今从正音，宜云印度”之记载，又改称印度。

著名的中西交通史研究者张星烺引王嘉《拾遗记》说：“周成王之世，有旃涂国、祇因国、燃丘国来献方物，老子撰《道德经》，有浮提国人相助。《庄子·山木篇》有建德国。似皆指印度而言。”周成王为西周（公元前 1100 年—公元前 770 年）周武王之子，其时代约为公元前 11 世纪末至 10 世纪初。这说明有记载的中印两国交往，可上溯至公元前 11 世纪的周朝。季羡林说：“在乔底厘耶所著《治国安邦术》里有产生在脂那（即 China，中国）的成捆丝的话，乔底厘耶据说生于公元前 4 世纪，是孔雀王朝月护王的侍臣。据此迟至公元前 4 世纪，中国丝必已输入印度。”张星烺又引德国学者雅各比引证旃罗笈多王朝史家卡蒂亚“脂那（指中国）产丝及纽带，商人常贩至印度”的记载，来说明同样的观点。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成书年代为公元前 4 世纪至公元 4 世纪）也有“中国丝”的记载。这说明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最晚不会晚于公元前 4 世纪的观点是可信的。

早期中国的丝绸输往印度，不是从西北或海上丝路，因为西北和海上丝绸之路，是西汉武帝时（前 140—前 87）才开通的，而南方丝绸之路则早已存在。从长沙马王堆战国墓出土的琉璃珠和云南出土的梵字瓦及文献记录来看，早期从中国输往印度的，还有青铜、白铜、铁、瓷等制品。以白铜为例，《华阳国志·南中志》说，朱提郡（治今云南昭通）的堂螂县（今会泽、巧家、东川）“出银、铅、白铜”。据百度百科提供的资料，公元前 170 年，大夏国（今阿富汗）就已用白铜铸造潘塔列昂王币，其白铜中的镍含量高达 20%。从合金成分、色泽、形状分析，史家认为，该国的白铜是从云南经印度运去的。印度输往中国的有琉璃、琥珀、玛瑙、香料、药材等。1955 年 4 月 5 日，新华社报道说：“云南省经过 3 年

多的文物普查，进一步证实了公元前3世纪从四川经云南通印度的西南丝路的存在。”

二、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是印度与中国古代文明频繁交流的历史必然

印度文明又称印度河文化。印度河文化（约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750年）以有发达的水利灌溉、设计缜密的街道、公共浴室、砖造楼房、排水系统等极具现代观念之都市设计要素而著称。1921、1922年，印度考古学家在印度河流域发掘出莫汗佐达罗、哈巴拉两座古城，就属这个时期的文明遗迹。公元前2000余年，雅利安人越过兴都库什山脉，侵入印度河上游的五河地区，并进入恒河流域，征服土著，建立种姓制度，将社会分为4个等级：婆罗门（祭司）、刹帝利（王族）、吠舍（商人、农人）、首陀罗（奴隶）。

这个时期相当于我国的夏（公元前2029—前1559年）、商（公元前1559年—前1046年）时期，传说禹传子启，建立了夏代。早在禹之前约黄帝、尧、舜时代，黄帝就开发了利用水井灌溉、建造车船、铜镜、房屋等的技术。传说他建立了市场、制定了法律、礼仪，社会经济文化都有空前的发展。至夏、商时代，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比印度河文明发展水平要高。公元前2100年至公元前500年是中国的青铜时代。商代的青铜制作高度发达，且有了文字。

公元前600—前500年（相当于我国春秋时期），印度的婆罗门教日渐衰微，释迦牟尼创立佛教，以革婆罗门教的腐败，并打破种姓制度而组成教团。当时中印度西苏纳加王朝兴起，至阿阇（she，泛指僧）世王时，在君摩揭陀国（恒河中游强权），佛教受到阿阇世王保护，盛行于印度。这个时期是中国儒家学说勃兴的时期。相传孔子（前551—前479）有弟子三千，著名者有七十余人。他整理《诗》《书》等古代文献，删改鲁国史官记录的《春秋》，

编成我国第一部编年史。《论语》一书载其言行。大约佛教在印度兴起时，中国创立了儒学或儒教。

公元前 327 年始，希腊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入侵印度。占有印度河北部的平原之地。出身孔雀家族的印度难陀部族的青年旃陀罗笈多领导人民平定北印度，以摩揭陀国的华氏城（今巴特纳市）为首都，建立孔雀王朝。他开拓与希腊的交通，融合印度文明与希腊文明，创立著名的“希腊印度式艺术”。公元前 268 年，其孙阿育王即位，统一了全印度，并大力推广佛教，派佛教法师至各国弘法，形成佛教隆盛时代。这个时期相当于我国的战国时期。孟子（约前 372—前 289 年）是这一时期中国儒家文化的代表，他受业于孔子的孙子，以孔子传人自居，提出“民贵君轻”“施仁政”等思想，主张恢复西周时代的井田制。

中、印两大古老文明在漫长的发展中不可能不发生交流。《纪古滇说集》、《滇史》说，周宣王时（前 827—前 782）“西天竺阿育王有神骥一匹……一纵直奔东向而去，三子各领部众相与追逐……至滇之东山……西山……北野……王……遣舅氏神明统兵以应援。将归，不期哀牢夷君主阻兵塞道，而不复返矣……遂归滇各主其山。哀牢国，永昌郡（治今保山）也。”这个传说虽然不尽可信，但它是数千年来一直流传至今，为中、印史家所共同重视的口头传承，是有参考价值的资料。印度与中国的交流，夏、商、周至汉武帝开通西北丝绸之路以前，都是通过缅甸而至中国的。缅甸史家貌丁昂的《缅甸史》引《缅甸编年史》，说古印度王子来缅甸所建的太公城（在今抹谷附近）建于公元前 850 年。另外两座上缅甸的古城哈林伊和佩塔诺米（此城的遗物碳测定年代距今两千年）。英人哈威《缅甸史》说：“阿婆醯罗娑与释迦族人来自印度妙德城，纪元前 850 年建太公城。”上述三座古城，既是印度早期与缅甸进行交流的产物，也是为进行与中国的交流而建的。由于这条

中、缅、印交流古道的畅通，有些政治、文化交流也通过这条道路来进行。如《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哀牢传》说：“安帝永宁元年（120），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肢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冯承均《中国南洋交通史》说：“掸国地处上缅甸，其来也，或遵陆路而非循海。”“所献大秦幻人疑是南天竺之幻人，盖南天竺一名，即《法显传》之‘达亲’，”天竺幻术自掸国经云南献给东汉王朝，走的就是这条道路。东汉时也有印度僧人从此道来华，如摄摩腾（迦叶摩腾）和他的同伴可能通过伊洛瓦底江上游河谷到达云南。在2—3世纪，有20多个僧人通过四川、云南到印度。笈多王朝为他们建立了一座庙宇叫支那寺。道宣《释迦方志·游历篇》卷五说：“南朝宋元嘉中，冀州沙门慧睿又游蜀之西界，至南天竺”。这是南朝时中国僧人经云南至印度的记载。另外，《太平御览》引用了咸通时（860—873年）一个三藏和尚经过成都的例子，他表达了要从云南经相邻的北印度路线回印度的愿望。

三、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的走向

昆明（滇国之都、西汉益州郡治）是南方丝绸之路的中心和枢纽。在我国境内，从其经青蛉（今大姚）、弄栋（今姚安）、三绛（今会理西南）、邛都（今西昌），沿灵光道至蜀（今成都）。其次是经朱提（今昭通）至僰道（今宜宾）。其三是出东北经夜郎国（治今安顺）和巴国（治今重庆）。这是一些史家认为楚将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西”来滇的路线。其四是东出且兰国（今黔东黄平一带）之北，沿沅水至楚都荆州。这是另一些史家认定的庄蹻“泝沅水，出且兰以伐夜郎”而至滇的路线。不管庄蹻是“循江上”还是“泝沅水”，都说明当时的滇国之都与楚都有畅

通的交通线。其五是南经句町国（治今广南）而达邕（今南宁）。

从滇至身毒（印度），是西经叶榆（今大理）、嶲唐（今云龙）、永昌（今保山）、滇越（今腾冲）至缅甸的密支那，再北上至葡萄，向西入印度的萨地亚、提斯浦尔、高哈蒂（印度古国迦摩缕波的首都），终点是摩揭陀国的首都华氏城。南方丝绸之路在印度被称为“阿萨姆—缅甸路线”、或“阿萨姆—昆明路线”。一位研究印中古代交通的印度学者说：“这条古代印度通往中国的阿萨姆—缅甸路线，始自印度的古都华氏城、经过瞻婆（巴加尔普尔）、羯朱暇祇罗（拉吉玛哈尔）、奔那伐弹那（北孟加拉）、直到阿萨姆的迦摩缕波（首都：高哈蒂）。从阿萨姆至缅甸，古代如同现在，有三条：第一条沿布拉马普特拉河至帕特开山口，直到上缅甸；第二条通过曼尼普尔，直到钦敦江河谷；第三条是通过阿拉干，直到伊洛瓦底江河谷。所有这些路线会合于八莫附近的缅甸边境，然后继续翻越崇山峻岭，到云南府及昆明盆地（昆明是中国南部省份中的主要城市）。八莫和密枝那作为印度与中国之间的链环，是相当重要的贸易中心。在布拉马普特拉河谷内，人们从水、陆两路，通过萨地亚、格比利、高哈蒂、提斯浦尔进行旅行。高哈蒂是古代强大的迦摩缕波国的首都，其东接缅甸贸易路线，西连印度繁荣的商业及水、陆两路货物的转运中心。在阿萨姆从提斯浦尔、帕尔巴蒂亚、北高哈蒂、戈拉加特、迪马普尔到布拉马普特拉河南北两岸更东的地区，有广阔的遗迹分布，展现了古印度东北地区有一副繁荣壮观的光辉图景。这样的繁荣，可以推测出印度与中国有活跃的贸易。”

南方丝绸之路的终点或起点，之所以是古印度摩揭陀国的首都华氏城，说明它在印度政治、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印度的孔雀王朝开拓印度与希腊交通，创建“希腊印度式艺术”，以及阿育王即位后摩揭陀国把佛教推向世界，都和有这条路线与中国进行

活跃的贸易分不开。

在中国境内，南方丝绸之路有多个起点。这些起点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都是中国蚕丝的生产中心。考察一下我国蚕丝的源流，对认识南方丝路的多元起始点是很有必要的。1926年，考古学家在山西夏县西阴村的仰韶文化层，出土一个人工切下的半个茧壳。茧比蚕小，据说是野生在桑树上的桑蚕，但经台湾故宫博物院将此茧壳放大，知其是长江下游野生绢丝虫的一种。仰韶文化期（前4000年左右），华北地区气候温和，所以那时山西有野生绢丝虫吐的丝是可能的。如果这还不足为信的话，那江苏吴兴县钱山漾良渚文化第四层出土地面绢织品则可证明早在公元前3000年，中国就有丝织品的生产。“根据《书经》、《诗经》或《史记》等古文献记载，现在的山东、河南是绢的主要产地。但是最近从长江流域的汉墓和楚墓里发现大量的绢制品，可知自古以来绢产于从淮河流域到长江流域一带”。^①《管子·小匡》说：楚国“贡丝于周室。湖北江陵、湖南长沙楚墓中出土大量的丝制品。长沙五里牌406号战国墓出土绸、绢残片。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一件素纱禅衣，薄如蝉翼，衣长128厘米，袖长190厘米。把荆州作为南方丝绸之路长江流域的起点之一，是不成问题的。楚将庄蹻开滇，就是因为有南方丝路的商道存在，其所率2万楚兵，才能顺利到达滇国。成都为中心的四川盆地、重庆为中心的巴国地区、宜宾为中心的川南及滇东北地区、保山为中心的滇西地区，也是古代南方养蚕和产丝及丝织品的中心地区。当时养的蚕有一种为柞蚕。柞蚕是一种昆虫，比后来家养的蚕大，幼虫全身长有褐色长毛。柞蚕吃栎树上的叶子，吐的丝是丝织品的重要原料。《蚕书》说‘柘叶饲蚕为丝。’《天工开

^① 日本学者佐佐木高明著：《照叶树林文化之路》，80页，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

物》卷上《叶料》条说：“又有柘叶三种，以济桑叶之穷。柘叶，浙中不经见，川中最多”，叶可喂蚕。唐樊绰《蛮书》说：“蛮地无桑，悉养柘蚕绕树。村邑人家，柘林多者数顷，耸于数丈。”这说明直至南诏时期，滇西地区养柘蚕的习俗还很盛。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地处今渝、鄂、湘、黔结合部地区的巴国，西周时期就发展到“桑蚕（丝）、麻、纻……皆纳贡之”的阶段。春秋战国时期的哀牢国（治今保山），《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土地沃腴，有黄金、光珠、琥珀、翡翠、孔雀、犀、象、桑蚕、绵绢（坚韧的丝织品）、采帛文绣……有梧桐木，其华柔如丝，民绩以为布，幅广五尺以还，洁白不受污，俗名桐华布，以覆亡人，然后服之及卖与人；有兰干细布，兰干僚人纻（zhu，指苎麻织的布）也，织成文如绫锦（有彩色花纹的丝织品）……宜五谷，出铜、锡。”输往印度的“中国丝”，相当一部分是哀牢国的手工纺织产品。将巴（治今重庆）、蜀（治成都）、僰道（治宜宾）、哀牢（治今保山）作为南方丝路的起点也是不成问题的。我认为，由于起点存在的多元，历史上将这条路叫做“蜀身毒道”是不够准确的，应该把滇国之都作为这条路的共同起点，将它叫“滇身毒道”。

四、余 论

在结束本文之前，尚有下列3点需要论及：

（一）中国南方各民族是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开拓者和经营者。以云南为例，早在新石器时代，云南少数民族先民就发展了较好的农业、手工业。农业以野生稻和野生绢丝虫的驯化、培育为代表。由于气候湿润温和，各地森林中有各种各样的作茧昆虫。西南各少数民族的远古先民，采各种天然虫茧抽丝，经过不断的选择和培育，从众多绢丝虫中选定蚕进行饲养，并以其丝进行绢（质地

薄而坚韧的丝织品) 的生产。《华阳国志·南中志》所载春秋战国时期哀牢国的“桑蚕、绵绢、采帛文绣”，绝大多数是用当地人生产的蚕丝制作的。这些当地的蚕丝，与来自蜀、巴、楚、滇等国的丝和丝织品，就是公元前 4 世纪以前输往印度的中国丝和丝织品。就云南而论，晋宁石寨山出土的 4000 多件青铜器中，有一号墓中出土的一铜鼓形贮贝器盖上，铸铜俑 18 人，沿边坐着纺织者。从右起，有两人在纺织，不用纺轮而以手捻之，次为 6 个纺织者，各用原始的腰机而织。最后一人右傍置一案，案上有织成的布二匹，案中间置有光滑形圆如卵石的石器一个，大概为最后加工把布磨光之用。这些人都向着奴隶主而坐，而奴隶主则坐于上首短梢上，双目炯炯，似在监视织布者。其周围为侍候之人……其前一人跪于地，左肩是一大口布袋，似在向奴隶主有所禀述，这大概是管理者。这个场面是从纺织到织成成品的全过程。其中包括有管理者、监视者、纺织者。这不是一种家庭作业，而是一个纺织工作作坊，因其中包括有七八种不同服装的民族、生产者有七八个民族，其中有滇族。滇族而外，每族仅一人。这一个图案说明，早在春秋时期，滇国就有手工作坊式的纺织业。这种纺织业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是适应中、印丝及其制品贸易的需要。

(二) 南方丝绸之路不仅只是中、印进行经济贸易的物流通道，而且是民族迁徙的走廊。在丝绸等输印度的同时，云南藏缅语族先民不断移入印度，印度居民也大量移入云南。云南移入的人被称为博多人。博多人一度在北比哈尔、北孟加拉、东孟加拉和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形成一个牢固的蒙古人种集团。遍布阿萨姆、那加兰、曼尼普尔、梅加瓦蒂等邦的卡查里是一个庞大的博多人集团。他们赋予阿萨姆居民特殊的蒙古人气质。谷格那加人传说，他们从前住在中国的云南省。大约在几百年前，中国发生了大饥荒。他们经由缅甸逃荒到那加山定居下来。直到今天，他们唱的一支民歌还有这

样的歌词：“我的第一个祖国是中国。”堂库尔那加人说，他们的祖先是由两个勇敢的兄弟自世界的东方带来的。他们要寻找一个地方定居。由于长途劳累，要找一个地方歇息，他们找到了一个地方，但很快感到气候炎热，遍地是毒虫，决定另找一个地方。他们将这个队伍分为两个部分，哥哥那尔加，率一部分向东南方推进，到那加山定居下来；弟弟的队伍在平原定居下来，这就是曼尼普尔谷地。这个传说中讲到的来自世界的东方，很可能就是古代中国的云南。

从中国移入印度的藏缅语族的先民，一部分接受了印度教，与印度的达罗毗荼人、雅利安人混血，形成雅利安—蒙古人种，但他们至今仍保存云南藏缅语族人的文化。而另一部分未与雅利安人混血，称为印度东喜马拉雅民族的人，至今还保存着云南藏缅语族各民族的生产生活习俗。这些与中国民族有渊源关系的印度民族，为中印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构建了一根割不断的种族亲族的血缘纽带。南方丝绸之路的历史地位和现实价值，通过这根纽带的存在，使人们认识得更清楚。

（三）南方丝绸之路是中、印两国人民数千年友谊的结晶。1951年1月26日，毛泽东主席应邀出席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举行的印度国庆庆祝会，在会上致辞说：“印度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印度人民是很好的人民。中国、印度这两个民族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几千年以来是很好的。今天庆祝印度的国庆节日，我们希望中国和印度两个民族继续团结起来，为和平而努力。全世界人民都需要和平，只有少数人要战争。印度、中国、苏联及其他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团结起来，为远东和平、为全世界的和平而努力。”李克强总理说，中、印是“天然伙伴”。他还引了季羡林“天造地设”的话，来说明中、印之间的伙伴关系是天造地设的。毛主席和李克强总理的论断，为中、印之间今天和未来深化合作指明了方